

高 教 信 息

2017 年第 4 期（总第 191 期） 上半月刊

南通大学高教研究所 摘编
电话：85012087 85012710

网址：<http://gjs.ntu.edu.cn>
E-mail: ntgjs@ntu.edu.cn

本 期 目 录

一版【要闻摘编】【标题新闻】

二版【高校发展】

建设思路创新：发展与改革并举

共建高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三版【大学文化】

大学治理文化的内核

文化育人是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新的发展

四版【学院治理】

完善二级学院治理结构

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的路径选择

五版【供给侧改革】

推动地方高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向

六版【“双一流”建设】

立足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双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七版【大学筹资】

推进筹资活动稳定、持续和常态化发展

高校吸引捐赠机制的构建

八版【通识教育】

从“通识教育在中国”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一版 要闻摘编

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

4月6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

《意见》瞄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

在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机制上，《意见》明确对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高校，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可不再要求培养年限。落实和扩大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意见》指出，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外，高校自主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内的专业，报教育部备案；自主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

《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意见》明确，试点高校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高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

在改善高校进人用人上，《意见》明确高校根据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需要，自主制定招聘或解聘的条件和标准，自主公开招聘人才。政府各有关部门不统一组织高校人员聘用考试，简化进入程序，为高校聘用人才提供便捷高效的人事管理服务。

《意见》进一步改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明确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校，标志着彻底取消行政部门对高校教授和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审批管理方式。同时，改进教师职称评审方法。高校要将师德表现作为评聘的首要条件，提高教学业绩在评聘中的比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师，按照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研究类型，建立分类评价标准。完善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

为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意见》明确要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可采取年薪制、协议

工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绩效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业务骨干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作人员倾斜。高校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

在明确简政放权举措的同时，《意见》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和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和学术治理，强化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要求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协调与指导，营造良好改革环境。（《中国教育报》2017-04-07）

教育部进一步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

2017年试点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已经开始，为维护自主招生公平公正，近日，教育部下发文件，进一步严格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严厉打击自主招生中的专利、论文买卖和造假等行为。

文件提出“五严格”工作要求。一是严格报名条件。要求考生提交的发明、专利、论文等申请材料，须要求由考生本人原创，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二是严格材料审查。要求试点高校组织校内外专家严格审核考生提交的证书、发明、专利、论文等申请材料，以及有关学校、单位或专家提供的推荐材料，仔细甄别其真实性、可信度和考生参与度。三是严格学校考核。要求试点高校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报名审查通过的全部考生开展科学、规范的深度考核，重点考核考生是否具备申请材料呈现的学科能力、创新潜能、学术潜质，实际水平是否达到应有的程度，不得以任何条件免于考核。四是严格监督制约。要求试点高校完善校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严防自主招生权力寻租。要求中学、试点高校、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认真执行自主招生信息公开要求，畅通考生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五是严格惩处造假。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试点高校和中学对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生，依据相关规定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和高考相应资格。对违规违纪的学校、单位和个人，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严重违规违纪的高校，暂停或取消自主招生资格。（教育部网站2017-04-13）

我国留学回国人员已达 265.11 万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在4月11日召开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表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其中2016年回

国 43.25 万人，再创新高。今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要聚焦“高精尖缺”，聚焦“中国制造 2025”，聚焦服务“双创”，聚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实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广聚天下英才，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我国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 2012 年的 72.38% 增长到 2016 年的 82.23%。“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6000 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人才 5.39 万人，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 1978 年至 2008 年引进总量的 20 余倍。

同时，省部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 49 家，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 347 家，入园企业超过 2.7 万家，7.9 万名留学人员在园创业，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显示出强大的“人才磁铁”效应。（中国经济网 2017-04-11）

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成立

4 月 10 日至 11 日，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晓红出席会议，向第七届高评委全体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当选第七届高评委主任委员。他表示拥护部党组决定，感谢全体委员信任，一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执行部党组决策部署，尽职尽责、不负重托。他指出，做好第七届高评委工作，必须按照《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要求，把握基本稳定、从严从紧、质量提升、协调发展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一条主线”贯穿，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坚持“一本章程”遵循，严格执行《第七届高评委章程》；坚持“一套程序”推进，落实好评议各地规划、评议申请学校、了解规划落实、开展政策研究的任务；坚持“一把尺子”衡量，依据高校设置条例和分类设置标准开展考察评议；坚持“一条底线”要求，严守纪律规定，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评审。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高评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秘书长，审议通过了《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章程》，讨论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条例》和《普通高等学校分类设置标准》。全体委员签署了廉洁自律承诺书，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及教育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和民办学校的委员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中国教育报》2017-04-13）

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 实现国家助学贷款全覆盖

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 11 日共同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等教育学生（含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预科生）资助工作，实现国家助学贷款全覆盖，确保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通知指出，进一步拓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覆盖范围，实现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培养单位全覆盖，实现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预科生全覆盖。尚未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培养单位，从 2017 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办，其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四部门强调，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确保其顺利就学。在分配资助名额和资金时，不能简单地划比例、“一刀切”。各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专业为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高校等培养单位倾斜。

同时，高校等培养单位在评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要采用科学合理、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等内容时，不应涉及学生隐私。宣传学生励志典型时，涉及受助学生的相关事项，应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光明日报》2017-04-12）

标题新闻

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落实 2017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依靠改革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确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坚决打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硬仗。设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扩大就业见习补贴使用范围。（《中国教育报》2017-04-06）

2. 4 月 11 日，教育部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青海，青岛等六省（区）、市在京签署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会见六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代表教育部与六省

(区)、市签署备忘录。通过省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平台签约，基本构建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总体工作格局。（教育部网站 2017-04-11）

3. 4月10日上午，2017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峰会暨第十一届KAB创业教育年会在郑州召开。活动围绕“大学生创新创业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主题展开，以深化大学生创业实践为导向，以增强大学生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的意识 and 能力为重点，以凝聚各方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力量为目的，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7-04-110）

二版 高校发展

建设思路创新：发展与改革并举

高等学校要谋划好“双一流”建设，必须在建设思路创新。从实践层面而言，就是要观照高校系统外部发展要素，把握经济社会重大科技创新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综合改革推进高校内涵提升。

1. 以“双一流”建设引领高校整体发展

实施高校“双一流”建设工程，首先面临如何理顺即将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项目与高校其他已有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毋庸讳言，当下高校建设普遍存在项目建设碎片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建设项目多元、目标指向各异、内容衔接性不足和部门协同性不够等，影响了高校整体建设绩效。因此，理顺“双一流”建设项目与其他各项建设项目的关系，形成有机统一建设整体，是高校层面“双一流”建设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一流”建设项目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引领作用，高校应以“双一流”建设项目引领其他各类建设项目，统筹各种资源，整合各类建设项目资源，形成建设合力和凝聚力，提升高校整体建设成效。

以“双一流”建设引领高校整体发展，就是要以“双一流”建设项目为龙头，其他建设项目要服务于“双一流”建设，主动配合好“双一流”建设。这就要求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平台建设、人才培养条件建设等其他建设项目与“双一流”建设项目有效衔接与协同。各类建设项目资源整合，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学科引领、统筹集成、改革驱动和管理创新。所谓学科引领，就是聚焦重点学科建设，将高校各建设项目目标统一到高校整体建设与发展的目

标上来，统一到高校特色办学与特色发展上来，从而解决高校各建设项目目标各异的问题。所谓统筹集成，就是统筹集成现有高校各建设项目，将现有各建设项目形成有效汇聚，形成合力，进而解决各建设项目内容分散、内容缺乏统筹的问题。所谓改革驱动，是指在高校各重点建设项目的整体推进过程中，要通过高校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改革现有影响并制约各重点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制度弊端，释放改革活力，尤其是要解决管理上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不足以及相互割裂的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各建设单位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缺乏竞争的机制问题。所谓管理创新，是指在各建设项目的建设与管理过程中，要构建起鼓励勇于创新、勇于试点改革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建设模式、管理模式、管理机制创新，确保各建设项目的建设成效。

2. 以学科建设统筹高校系统建设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对象是学科，“双一流”建设关键在学科建设。因此，高校“双一流”建设必须从学科层面强化内涵建设与系统化建设。以学科内涵建设统筹高校系统建设，要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主体要素，同时关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包括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两大功能要素，构建起“一体两翼”的内涵建设模式，其中“一体”就是指师资队伍建设，“两翼”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高校“双一流”建设要以学科建设统筹高校系统建设，是学科建设固有内涵使然。谢桂华教授将学科建设界定为“以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导向，由学者—社会—政府共同推动的、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相互促进的、围绕各类学科而进行的生产—传播—应用知识的活动”。基于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从高校微观层面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组成要素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学科建设定位于高校管理层面，即学科建设是一种管理工作，包含学科规划、学科内涵建设、学科建设过程监控以及学科建设绩效评价等管理活动；另一种观点是将学科建设定位于高校建设层面，即学科建设是以学科为依托的办学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具体办学活动。结合高校“双一流”建设，显然要从高校建设层面出发，统筹加强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系统建设。

3. 以综合改革推进高校内涵提升

国务院颁布的《方案》政策文本中，除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外，主体内容包括建设任务和改革任务两个方面。较之于以往的“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方案文本，

新增了改革任务，既强调建设任务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改革任务的重要性，这既是贯彻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切实推进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更是当下高等学校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水平的客观需要。

高校“双一流”建设要解决好改革与建设的关系，首先要厘清改革与建设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改革重在变革旧的事物或关系，解决存量问题，而建设在于增添新的事物，解决增量问题；改革的关键在于改革“生产关系”，理顺生产关系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建设在于发展“学术生产力”，提升学术生产力水平。当下高校发展既存在存量问题，也面临增量问题；既需要理顺“学术生产关系”，也需要发展“学术生产力”。因此，“双一流”建设要实现建设与改革两者兼顾，二元并举，以综合改革推进高校内涵提升。实践中，要形成改革与建设的有机互补，相互促进，将建设聚集于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的内涵建设，提升高校实力和水平。当然，“‘双一流’建设不可能依靠‘打补丁式改革’来实现，而需要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和结构的调整”；综合改革的关键是要聚集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顺高校党政之间、校院系之间、学术与行政之间等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为“双一流”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共建高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共建高校工作从试点到全面拓展以来，在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和高等教育质量、效率和公平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研究中发现，当前共建高校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第一，对共建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从共建主体看，很多地方政府不重视或忽视本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像发展经济那样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甚至将高校视为经济发展的累赘。与中央部委共建，有些仅是走走过场，或将划转高校作为地方政府向部委要钱的借口和筹码，不是真心通过共建将高校办学水平提高到新台阶，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共建客体看，许多高校千方百计想挤进共建高校行列，主要目的是要钱、要学位点和重点学科，甚至还想升格，希望能抓住机遇成为“国家队”。有些地方高校曾直接表达了希望将其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企求。还有高校只是觉得成为共建对象很有面子，作为地方高校可参加教育部直属高校会议，可与部委或部委属高校干部交流。至于自己的共建目标是什么，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就加入了跟风随大流行列。师资队伍相对较弱、教学科研设备及水平较差的地方高校，不是把共建目标定位在恰当位置，而是盲目攀比

高水平大学，只重其名，而不求其实。

第二，共建工作实施不平衡。作为共建主体，共建协议签订后，高校主管方比较积极，而其他共建部门工作稍显被动。特别是存在个别共建主体拖欠承诺的教育投资，甚至出现相互推诿、扯皮、推卸责任，非但不给共建高校带来好处，反而阻碍其发展的现象。有些部门只重视共建协议的签署，不重视后续共建工作的开展。共建协议一般是较宏观的原则性条文，要想共建取得实效，还要几方制订具体共建项目和实施方案，否则共建协议只能流于形式。网上调查发现，只有少数共建高校设立了专门共建工作机构，大多数高校共建工作只作为临时事务由学校办公室或其他部门临时承担。

第三，共建工作有效性评价与监控不完善。共建高校工作开展以来，各高校共建工作发展不平衡，原因之一是缺少统一的共建高校工作评价监控系统。共建高校工作大都各行其是，随意性较大。关于共建高校工作的实际效果，没有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在共建工作组织结构上，也缺少监控和评价环节，使很多共建高校活动只注重签订协议，而不注重过程和结果评价，导致共建高校工作没有经常性信息反馈，共建工作的效益有待提高。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共建高校工作健康发展，实现共建高校工作的原初目的，需要共建高校工作主管部门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规划并制订共建高校的发展战略与实施举措。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共建高校协议的达成是重要的机遇，但共建部门和高校不能仅满足于共建协议的签订，要在协议大框架下研究制订具体的、可操作的共建发展战略，以及实现协议和战略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共建期内，各方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与优势，拟订年度共建项目，提出实现期限，使共建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在谋划共建战略和实施步骤的同时，加深各方对共建工作的认识，为实现共建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成立共建高校工作领导与工作机构。共建工作要常态化并取得实效，需要专门工作机构承担职责。从对各类共建高校工作的调研看，2004年开始实施的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较于其他类型共建高校更为突出，表现在其工作组织和运行上。网上调查各共建高校组织机构设置发现，省部共建高校组织机构相对健全。教育部专门成立了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挂靠山西大学，与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合署办公，承担日常管理 and 研究咨询工作。此外山西大学还单设了省部共建工作办公室。其他几所高校如西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工作办公室与发展规划处合署办公；江西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省部共建工作办公室、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合署办公，将研究、规划、沟通、实施很好结合在一起；河

南大学成立了“211工程”与省部共建办公室，挂靠研究生院，侧重学科建设与学位点申报；河北大学省部共建办公室跟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办公室合署办公，其职能是密切与主管部门和其它“省部共建”高校的交流与协作，促进“省部共建”工作的实质性进展。浙江工业大学等地方共建高校都设有省部共建办公室。其他类型共建高校要借鉴这一经验，从共建主体到共建客体都要设置相应的组织结构，发挥组织协调职能，真正使共建工作取得成效。

三是建立共建高校工作评价与监督机制。共建工作实施效果如何，需要科学的评价和有效的监督作支撑。建立共建工作评价监督体系，一方面与共建协议和共建战略规划相呼应，为协议和规划的实施提供外部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有效的评价和监督，可使共建工作不断完善，越来越接近共建工作实施的目的。共建高校工作评价与监督机制可由主管部门牵头，通过制订明晰的共建工作目标，监督共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共建协议和规划和调整形成完整的反馈机制。按不同共建高校类型，开发适当的共建工作评价工具，对共建成果、质量和绩效进行定期评价，不断完善共建高校各方的工作，为今后共建高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实现共建主体和客体“双赢”，为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提升及区域高等教育公平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三版 大学文化

大学治理文化的内核

老子曰：“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其善治就是指一个好的治理，要像水一样“利物而不争”。“善”即包括一系列价值元素，如公正、理性、自由、平等、信任、情感认同等。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只是器物层面或工具理性层面的现代化，更要重视内在的价值和精神的现代化。在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其内在的核心理念，包括大学核心价值认同、大学参与主体互信、大学愿景共生等要素，它们构成大学治理文化的内核。

（一）价值认同

大学治理效能取决于大学参与主体对大学核心价值的认同。在动态环境下，需要理解大学核心认同中的重要元素，并运用这些元素提升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社会参与人士等

各相关主体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何建立这种价值认同?追溯现代大学的起源,从教会—修道院—大学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发现,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担当反映社会进步和广大人民精神追求之职能的组织或机构。在中世纪,当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会无力维持意义境界时,经由修道院中介,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阐释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大学成为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精神空间。因此,从基督教信仰渊源走出的大学,与生俱来地是作为精神空间实体而存在,历史性地肩负着一一种包容并超越物质欲求和现实需要的信仰教化使命。伴随社会转型,大学虽然几经变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依然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唯有那执守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大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系统格局里才足以保持卓尔不群的地位,一方面,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知识生产与创新、为社会的进步思想代言,发挥其引领社会、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有良知、良能、良心的社会公民,纯化社会风尚,彰显时代精神,推动人类文化形态从科学文化走向艺术文化,实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全面张扬。

(二)主体互信

治理危机的深层问题是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将使治理变得异常困难,这既突出了从管理思维转变为治理思维的必然性,也为处于低阶的治理思维向高阶思维转换提供了路径。在治理框架中,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真正落到实处,存在着信任障碍。按照科层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决策层往往对民众有这样的质疑:民众是否真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怎么消除民众即使是在处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时也仍有可能存在的“搭便车”心理?民众是否真的凭借“参与”或“商谈”就能消除彼此之间或与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抑或“参与”和“商谈”只能处理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按照同僚治理模式的观点,民众通常对决策层也存有质疑:精英治理只是为既得利益集团发言,即使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之中,民众的声音是否如实地得到了尊重与反馈?例如,不少民众认为公开竞聘、集体投票的做法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反映领导意志,这种说法或猜疑,就展露出民众对组织核心层的不信任。若是如此,大学治理无论选择何种制度模式,如果主体之间不能建立互信,则都很难产出治理绩效、提升治理效能。比如,大学呼吁教育管理部门权力下放,而教育管理部门认为“一放就乱”,这就是大学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互信态度、互信机制所致。

(三)愿景共生

建立共同愿景,首先需要掌握和使用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主体之间,共同的心理认知能够带来共识,它根植于参与者对大学历史和未来的管制。各参与主体对大学未来的方

向达成共识，能够促使大学走向共同治理，因为大学的未来属于每一个人。当然，共同的语言不代表着言论一致、方式一致。21 世纪应该是一个创造性冲突的时代，人们既不回避冲突，又不扩大冲突，而是抓住冲突的契机，通过转化冲突而创造崭新的局面。在一个信任和共同语言已经形成的机构中，争鸣反倒有助于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高教探索》2015 年第 10 期）

文化育人是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新的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纲要》第十一章“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提出，文化素质教育要纳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之中，从而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在新的人才培养体制中的地位。随着文化素质教育思想的不断深化，“文化育人”“以文化人”成为其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

1. 文化育人与高等教育紧密联系

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全部精神财富的累积，是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在精神层面的积淀，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文化育人的取向。对高校而言，文化是大学的灵魂，也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深度。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育人，首要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新形势下文化育人的概念既有内涵式的深化，又有外延式的扩大。任何文化都有价值取向，映射在高等教育文化育人上，其价值取向就是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积极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相融合，价值观教育始终是文化育人的重要内核，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文化育人，归根结底是要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之融入每个青年学子的心灵之中。

2. 文化育人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育人是高等教育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是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育人是学生发展的根本需求，是文明养成的必要途径，更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的理念、主体、客体、目标、途径、模式与制度七大要素。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文化育人并不简单是知识育人的“补充”或者“基础”，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文化育人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具有使学生受益终身的长期功效。高校在构建科学的育人模式时，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应大力推进文化育人，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人文精神、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开拓的创新精神，使其内化到个人灵魂深处，凝结成个体精神气质，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文化层次、思想境界和精神品味。

3. 文化育人对素质教育的有效推进

随着对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本质的探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成为关注的焦点，文化育人成为文化素质教育思想新的发展，是文化素质教育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应以文化育人为主题，进一步深化、丰富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可以说，文化素质教育就是文化育人、以文化人，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能对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化育人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高校应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健全和完善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核心，以促进文理交融为重点，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and 个性发展。（《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2期）

四版 学院治理

完善二级学院治理结构

在处理好校院关系之后，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完善二级学院的治理结构，以保证其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保证内部各种权力合理配置，各种重大事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执行有力，同时，各种权力的运行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当前，我国大学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仍有诸多方面有待完善。

1. 关于二级学院的领导体制。高等教育领导体制是指高等教育领导机构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的统一体，其核心是高等教育领导权力的基本配置方式，包括高等教育行政领导体制和高校内部领导体制两个部分。前者主要处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主要解决大学内部党政之间、学术与行政之间的权力配置与运行，即处理大学内部党委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二级学院领导体制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制度化的形式规定了二级学院组织系统内的领导权限、领导机构、领导关系及领导活动方式”，是其进行决策、执行、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二级

学院领导体制，本质上是明确二级学院内部权力关系，对其党政组织的领导与行政职能的发挥，对学院各项管理工作的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二级学院科学、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的二级学院领导体制与大学领导体制变革相适应几经变迁。涉及二级学院的领导体制，应当明确党政关系，明确党委和行政的职责，这应该以制度的形式确定。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法”，对大学的二级学院的党委和行政权力的边界、各自职责、党政协调运行等重要事项应该加以明确。但从 92 个大学章程的分析结果来看，关于二级学院党委权力，仅有 27 个章程对其职权范围进行比较明确的描述，有 51 个章程仅进行了简单表述，有 14 个章程未对二级学院党委权力进行表述；关于二级学院行政权力，仅有 21 个章程比较明确地描述了二级学院行政权力的范围，58 个章程仅对二级学院行政权力进行了简单表述，仍有 13 个章程未涉及二级学院行政权力。

1990 年以来，我国大学二级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多年的实践证明，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对于保证二级学院正确的办学方向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党政联席会议是领导体制吗？”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然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二级学院领导体制，可以将其概括为党政共同负责制。也有人认为不是领导体制，只是议事制度或运行机制。领导体制应该包含党政各自的职责及党政关系，如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体制既明确了党政之间的关系，也明确了党政的职责，即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只是明确“院(系)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要经过党政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研究决定”，却并未明确党政之间的关系和党政的职责。还有人将党政联席制度理解为一种党政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还不是一种领导体制。

如何贯彻好“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规定，如哪些事项需要党政联席会议做出决策，如何做出决策，如何执行决策等。党政联席会议如同大学的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一样，需要有议事程序和规则。否则，就会造成因为各自的理解不同而导致行为不一致的现象，从而影响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执行。通过对 92 个大学章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尽管有 88 个章程明确了二级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但其中仅有 5 个章程明确规定了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程序，其余 83 个章程虽然有党政联席会议的相关规定，但所规定的内容流于表面，并未对议事程序和规则作出规定。

2. 关于二级学院中教授治学。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都十分重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强调“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2012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优化校院两级学术组织架构”“推进教授治学，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2014 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没有对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作出规定。

二级学院作为学术单位，其主要事务是学术事务，其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基于这样的事实，教师应该在二级学院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教授治学首先应该在二级学院体现。虽然，这些年来，一些大学的二级学院注意发挥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在学术治理中的作用，但是，对“什么学术事项”“哪些人”以“什么方式参与学术治理”，往往缺乏制度性规定，缺乏将制度性规定变成制度化行为的机制。有的二级学院虽有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但仍有“虚化”和“随意化”之嫌，缺乏章程规定，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

在 92 个大学章程中，有 72 个章程提出要在二级学院层面建立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等，其中仅有 21 个章程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二级学院层面的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的职责、构成或议事规则，有 51 个章程没有对此进行规定。此外，仍有 20 个章程没有提出应在二级学院层面建立学术委员会或教授会。因为缺乏监督机制和制度规范，在有些二级学院中，学术造诣比较高的人担任院长(系主任)后，个别人的“官气”很足，行政思维过强，主观武断，缺乏学术民主，有的甚至还利用行政职务之便考虑私利与教师争学术资源。

3. 关于二级学院民主管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很重要的一项是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201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及群众组织作用，健全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机制。实行党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及时向师生员工、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离退休老同志等通报学校重大决策及实施情况”。这些精神和要求也适用于二级学院，二级学院需要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教育部 2011 年发布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中明确“学校可以在其下属单位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该单位范围内实行民主管理和监督。”

二级学院改革发展的许多重要事项，需要听取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级学院有许多事关教职工和学生切身利益的事，需要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后再决策；二级学院的许多重要事项，需要师生员工知情，以便民主监督。如何发挥广大教师在二级学

院治理中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需要很好地研究，做出制度性安排，并很好地组织实施。

通过对章程的分析，在 92 个章程中，有 46 个章程只提到应在二级学院建立教代会，8 个章程提到应在二级学院建立教代会和学代会，有 3 个章程虽然提及要在二级学院建立民主参与机制，但在章程中却并未提及其具体形式。另外，还有 35 个章程没有提及应当在二级学院层面建立相应的民主参与制度。从章程的分析结果看，当前对二级学院层面的民主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其中绝大多数大学都没有将学生参与二级学院民主管理纳入治理结构。

“高等学校是一种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底部沉重’的学术组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等职能活动都是由广大教职员在学校基层组织中进行的，基层的自主权是职能活动健康发展，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当前，尽管我国大学的二级学院治理得到了一些关注，但与大学层面的治理相比，对二级学院层面的治理关心和实际举措明显不够。概言之，在多数大学中，二级学院仍然是隶属于大学组织的“生产车间”，其主体地位并未得到重视。在对 92 所大学章程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校院关系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校院关系，二级学院办学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在二级学院治理结构方面，大学章程未能起到应有的制度规范作用。在二级学院治理的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二级学院内部权力边界不清，缺乏相应的议事制度等。因此，二级学院治理首先应以建立新型校院关系为切入点，进而在领导体制、学术管理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从而不断提高二级学院的治理水平。（《中国高教研究》2017 年第 3 期）

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的路径选择

构建高校二级学院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克服内外部环境带来的阻力以及固有观念，选择有效的路径踏实推进治理工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二级学院需要立足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创新为动力谋求制度化、精细化建设，激发组织效能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整体素养。

（一）坚持以创新为动力的制度化建设

目前，“以人为本”理念逐步在高校成为广泛的共识，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广大教职工与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被有效激发，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管理思维与固化观念，这在理论上为高校二级学院治理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落实在实践中则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现代大学制度是二级学院治理工作落实的根本保证，其核心是明确了权力的如何分配与制度的有效设计，规定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科学设置事务决策的渠道与流程，注重教师

在组织决策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保证二级学院治理民主化的优越性，需要运用创新思维，变僵化的管理模式为灵活的弹性模式，赋予更多的积极性因素，营造相对宽松的氛围，形成有效的民主决策制度与激励制度。二级学院重大事务的决策要向全体教职工通报，并邀请教师、学生代表等共同参加，强化大众监督的方式与手段。尤其在培养大学生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方面，要创新制度设计，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服务能力及自我管理意识、独立人格等品质，以成为二级学院治理的有力支撑。“管理学中有一个闭合原理，和物理学中的闭合电路原理相似，即政策从决策到执行，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不是单向的，应该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不断调整、修正中才能达到最终满意的效果，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闭合原理’。在二级学院的管理权限范围内，有序地实施监督与反馈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保证各项管理任务在运行过程中的规范与透明，有利于整个管理流程的科学化。首先，应着眼于建立二级学院管理流程的全监控体系，经过广泛论证，出台科学的监督管理办法，依照制度成立监督机构，使其不受同级行政权力的约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实践活动中进行有效问责。其次，建立有效的责任分工机制，以学科划分的教研室、实验室为载体，实行领导分管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弱化二级学院管理者的行政强制力，并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第三，建立及时的反馈制度，如在现实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应同主要领导进行协商，反馈相应信息，保证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监督和反馈等相关制度的构建，能够有效解决二级学院治理中的执行力与约束力问题，让二级学院管理者同广大教师与学生之间产生紧密的纽带关系，进而帮助领导进行科学决策。

(二) 采用以协调为本位的精细化管理模式

“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文化和管理方法，最早出现在企业管理领域。”精细化管理强调的是精细的态度与严谨的方式，以细致入微的管理模式换取最大的效益。在高校落实二级学院治理过程中亟需启动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系统、规范的管理，提升管理的质量与服务水平。其一，精细化管理要做到岗位职责的细化，将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紧密结合，有理有据地规定具体的岗位职责，对管理人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分解具体的工作任务，并严格按照流程执行任务。“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学院的实际情况，建立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形成制度汇编。”其二，二级学院要从规划到实施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到计划制定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保证工作任务落实具有基本依据，尤其在制定教学计划中，二级学院作为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基层单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避免教学计划制定主体的单一化及行政化问题，更应从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及人才培养规格、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去设定指导思想与课程体系，各层领导、教师要发挥引导者的作用。而在执行过程中，二级学院要将工作细致化，提高运行效率与执行力，促进师生间的紧密配合，进一步做好组织管理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管理事务，要讲程序，且在程序中注重细节。其三，二级学院要将质量管理工作做精、做细，把握过程质量监控与管理，做好例行检查与评估，严格按照指标和程序执行，获取准确、客观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与统计，并对结果进行有效反馈，得出科学的结论，为优化高校二级学院治理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 搭建强力组织机构，畅通体制机制

高校实行二级学院治理模式，必须有效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畅通组织运行机制，构建强力的组织机构，维护与落实广大教职工的主体地位，使其在参与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伯顿克拉克认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更多的是冲突与制衡，一直以来对真理、民主、科学的永恒追求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灵魂。”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对自由的维护。保证学术自由，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与组织建设，为学者提供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二级学院需要重新规划学院学术委员会，有效保障学术委员的权力，重新界定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编制学科规划，合理分配学术资源，科学开展职称评定及学术鉴定工作，从制度设计与组织运行上落实二级学院治理工作。根据现代治理理念，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不能由主要行政管理者参与，而是由除此之外的其他教授组成，以有效保证学术自治，构建平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协调机制，追求民主化、自主化办学模式，避免因个人主观臆断而产生的主导性行为；必须合理地设置监督与约束机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调控组织的运行。二级学院应在合理论证的基础上搭建以教代会形式为根基的二级学院治理平台，健全院务公开的民主监督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公正，有效遏制学术腐败现象，并充分落实教代会的民主权力，关注学院的专业建设、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有效促进民主监督与决策，打通信息反馈的通道，更好地为全院师生提供实质性的服务。

(四) 提高二级学院基层教师的工作效能

高校创新二级治理模式从根本上需要教师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度与组织的变革皆是为教师参与治理提供服务的，但教师作为治理主体应从自我提升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提高整体素养与工作效率，为二级学院治理的有效落实担当责任，同时二级学院应从实际出发，做好教师培训与激励的保障性工作，促进教师能力素养的迅速提高。二级学院作为高校基层组织单位，首先要培养教师的师德、师风，培养其严谨笃学、乐于奉献的精神，“应当不定期地、全方位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为核心，以‘德为人先、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准则，以提高教师政治素质、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水平为重点，强化师德师风教育”，全力打造师德高尚的教师团队。二级学院完善治理体系还需要增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教师考核与评价机制，在实践中体现人文关怀。提高教师工作效能最为核心的工作便是内部培养，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高校教师也需要持续地“充电”，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学习，同时二级学院应合理安排教师的培训工 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着眼于教师专业技能及信息化技能的提升，以便于从总体上提高基层教师的核心能力，满足二级学院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身心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二级学院的治理目标，提升二级学院的治理效度。（《现代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五版 供给侧改革

推动地方高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精准把握学校的发展战略定位

地方高校应坚定“应用型”的发展方向，密切跟踪产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形势、创新驱动态势，在应用型的大学框架下搭建应用型的治理结构，设置应用型的学科专业，建设应用型的师资队伍、发展应用型的科学研究，实施应用型的人才培养，开展应用型的社会服务，塑造应用型的大学文化；坚守“地方性”的服务面向，围绕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核心关键技术升级、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求以及地域文化传承创新办学，在服务地方中求取高校办学的大作为；坚持“特色化”的办学策略，认真厘清本校办学资源和地方资源禀赋，搭建符合地方需要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契合地方需求的学科专业集群、开展针对地方实际的社会服务，从而在办学路径上与其他高校错位竞争、差异发展、特色发展。

2. 持续加强学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地方高校应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特别是应用型师资队伍的构建、面向应用的专业设置调整、面向市场的人才培养方案调适、面向产业的技术创新平台搭建等，加强学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大学章程为治理基础，冲破“象牙塔”的囿圈开门办学，引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立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良好

机制，实现“三链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融合、协调发展）、“三协同”（学校战略与地方发展协同、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协同、人才规格与行业需求协同）、“三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对接、科学研究与技术攻关对接、高等教育与中职教育和继续教育对接）、“三适应”（学科专业体系与办学定位相适应、学科专业理论视野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学科专业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3. 科学实施学校的办学资源集聚和调配

高校办学资源是高校战略发展的基本保障和关键要素，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高校办学资源调配的现实依据。目前，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地方高校应以契合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围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和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将人才培养的落脚点、科学研究的兴奋点、社会服务的聚焦点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教学科研的任务需求为资源配置的顶层指向，以高校任务需求的双核心（教学—科研）与行为需求的双主体（教师—学生）为基础与前提，以任务需求满足程度为效益评价的关键指标，进行高校内部办学资源的有效集聚和调配，实现办学资源的精准、高效供给。

4. 适时调整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

由于地方高校所服务区域的经济结构和主导产业不同，地方高校应密切跟踪所服务地方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趋势动态，结合学校实际，主动适应、自觉回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专业建设一体化的建设思路，适时调整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重点扶持优势学科专业。积极发展直接与地方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专业，“着力打造一批地方（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形成与地方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紧密呼应的学科专业集群，提高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切性，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企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5. 深度调适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在高等教育因“产能过剩”而转入“买方市场”的情境下，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度调适，突出地方人才需求、实践应用指向、创新创业能力，定位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围绕这一目标定位，以地方人才需求为导向、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产学研结合为路径，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机制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多元开放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长效培养机制，切实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各自为阵的问题。

6. 切实提高学校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

一是面向区域产业重大战略需求，以重点优势特色学科为依托，打造一批直接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和行业共性技术的科技创新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二是与企业深度合作，建立嵌入式的合作研发机构，通过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多种方式，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三是主动与科研机构、行业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方面的创新力量实行多形式合作，构建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中心和众创空间，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民生科技难题的合作攻关，有效服务经济发展；四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新型智库，围绕地方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凝练主攻方向，主动加强与相关决策部门对接，主动提供管用实用的对策建议，提高智库成果的针对性、实效性，形成地方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决策服务机构。（《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24期）

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向

（一）体系重构：在优化变革中强化顶层设计

1. 构建主体多元、职责明确和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受高等教育理念、时代变迁、大学使命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因此，一是要围绕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不够科学、结构不尽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和供需错位等现象，构建一种从重权力到重责任、重审批到重监督、重管理到重服务、重数量到重质量、重管理到重治理等全新体制。二是政府要转变管理职能和角色。要逐步实现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命令到协商、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的转变，在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引导高校、社会和市场既要立足高等教育的全局和长远，又要回应现实关切和呼应外部社会诉求，切实规范“管办评”和推进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三是构建权力分配合理、制度设计科学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权责明确的统筹协调管理体制。配置分配好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大学、政府间的管理职能权限，处理好高等教育系统内以及高校内部党的领导与行政、学术与行政的关系，界定各自职责权限。建立基于规则和教育法治、社会参与并独立于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机制，强化政府依照法律规则与程序对高等教育的监管。

2. 建立供需均衡、服务高效和灵活多样的办学体制

办学体制是关于谁有权举办教育机构以及教育机构如何办学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其中，谁有举办权是办学体制的核心。即办学体制要解决由“谁”举办学校的问题，包括“谁

投资、谁管理、怎么办”等方面。因此从办学本身来讲，办学体制处于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对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和投资体制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此，首先，要调整政府、社会和高校等多个主体所具有的办学权利结构，即政府从垄断的办学权、教育供给权利架构中部分退出，将办学权利在社会主体间进行相对平等分配，让高等教育的“经营权”回归高校以调动其积极性。其次，引入非政府社会办学力量，对现行公立高等教育进行分层办学、办类管理、分类发展和评估指导，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制度环境公平、激励机制健全和经费投入及融资渠道多样的办学格局。再次，遵循学术和市场逻辑，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优化组合配置，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市场化和多元配置进程，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确立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提升高等教育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构建有效的高等教育组织和制度架构。

3. 构建纵横贯通、互惠多赢和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高等教育系统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工作方式”。在推动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一是通过内部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增强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灵活性、合理配置学术和行政权利和引入市场机制。外部通过政策调整、资源配置竞争、合理构建政府、社会与高等教育关系并推动高等教育适应引领社会发展，以构建互惠多赢的系统内部和外部动力机制。二是构建协同创新的资源配置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财政政策、投资、学术、人才和科技等资源配置的创新和决定性作用，从而使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学术资源和知识生产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以矫正原有依靠政府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方式。三是以现代大学制度为基础，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内外动态协调机制，科学分配高等教育内部权力，建立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和外部政府、企业 and 市场等共同参与协调的工作机制，推动不同利益主体间权力配置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四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评价标准分层分类和动态调整、评价方法科学多元和评价结果准确运用的绩效评估机制，以便对高等教育运行进行科学评估及时调整。

(二) 回归本位：在引领和服务中追寻教育真谛

1. 回归人才培养基础本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智力支撑

人力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智力供给要素，而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是其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因此，高等教育供给侧的关键要回归到人才培养这个中心上来。因此，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培养理念。“美

国教育家马可·霍普金斯说：理想的学院是一根木头，一头是教师，一头是学生。”所以要充分尊重教师、促进其专业发展和热情，让教师以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和神圣的使命去看待育人工作，并将培养理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遵循发展和需求相统一的培养动机。让高等教育追求在知识探索基础上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精神或智慧、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同时，又能促进和满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需求。三是重塑教学的价值和效用。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强化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以能力为中心、能力以创新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教学价值取向。

2. 坚守科学研究创新本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源

高等教育通过科学研究产生新知识和新思想，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和提升社会各要素效率。没有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社会文化、科技进步和人类理性就得不到长足的进步。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推进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一要确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任务驱动理念。即高等教育要在秉承“为知识而知识和为学术而学术”同时兼顾“为社会需求而科研”和“国家需要”的科研取向，使探索高深学问与服务社会和国家需要紧密结合。二要围绕知识生产方式的跨学科协同性、集体性和生产主体多样性等特点创新科学研究模式，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要强化多主体协同互动研究、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以动态和更加开放的方式进行科研创新。三要变革科研评价和管理模式。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而独特的智力活动，评价要尊重科研人员劳动特点、采取同行评议兼顾应用价值及效果、形成以成果和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考核科研绩效评价政策。科研管理逐步形成淡化学科中心、遵循独立自由的科学研究精神、形成自由、理性、开放和协同的科研创新管理体制。

3. 强化社会服务职能本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承担社会责任

我国高等教育受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和美国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影响，同时又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集散地，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社会服务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因此，一要理性审视和强化社会服务职责既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功能的衍生职能，又是其重要本体职能。高等教育作为环境和遗产的产物，其人才培养的本体功能最终须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与环境发生关系并得到体现。二要遵循高等教育内外部发展规律，转变办学模式，构筑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对接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办学机制，通过多元合作、协同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联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推动社会经济产业发展。三要构建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完善的技术应用转移及社会服务体系 and 构建校企联合共同体，形成高等教育既是高深知识的生产地，又能胜任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经济转

型升级的推进器职能，还能担当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职能。四要健全社会服务评价和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价主导、社会组织评价参与、高等教育自我评价为基础的多元评价体系，构建高等教育在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激励机制和高等教育系统内人员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建设。

(三)要素升级：在改革中提升供给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

1. 构建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要素配置模式

人力资源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一要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即对系统内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成才成长，要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处处做到尊重人才和确保人尽其才。二要构建以育人为本、以教育人为本、以人的成长为本的高等教育系统人员管理模式。对学生要充分发展其潜质、以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对师资队伍建设要确实尊重其职业和知识创造的特殊要求，逐步以合同制、自由职业管理模式改变现行的事业编制管理模式，以加速人才流动性。三是创新优化高等教育系统内学术科研及管理评价模式、完善的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晋升及工作激励机制、体面的工作保障等机制，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2. 构建统筹兼顾的高等教育资本投入优化配置机制

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投资的社会收益率极高并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撑。因此，一要探索构建高等教育投入新机制，建立以基本办学经费和内涵建设经费为主的经常性投入机制、以教育改革重大项目为导向的专项统筹投入机制、以提高高等教育项目支出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监督评估机制。二要丰富投入渠道和改善投入结构。逐步改变现有单一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局面，形成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捐赠及混合所有制等多元主体投入机制；不断丰富和改善高等教育所有制结构，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资金扶持力度，不断扩大有效供给。三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通过不断提高系统内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丰富在职教育及培训形式，不断改善人力资本增量和存量。四是健全投入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强化对高等教育人、财、物等投入及资源配置与使用情况的管理及监督，构建投入效益监测、评价和分析机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3. 构建自由科学的高等教育创新氛围

高等教育具有独立自主、自由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属性，而这需要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氛围来实现和表征。所以，构建高等教育创新氛围一要塑造以创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尊重学

术科研的独立自由性，培育和创新大学文化，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和强化教学主体功能，拓展和提升大学文化，处理好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关系。二是高等教育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它不仅要求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更要具有开放性，为保持其长久的繁荣和活力，要推进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创新。三要推进综合改革与系统创新。高等教育是一个结构和运作程序复杂的动态组织系统，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从高等教育体系整体出发，在外部要构建与社会各系统间的新型关系，在内部要以现代大学制度为基础理顺、调整其治理结构和组织关系，从而推动其整体系统创新。四要围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及知识生产核心，通过资源和利益共享机制，构建由政府主导下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多元创新主体联盟，形成面向科学前沿、行业产业、区域发展及文化传承等不同需求的创新模式。

4. 构建协同共享的高等教育知识生产体系

知识及其增长作为高等教育本身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高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知识的丰富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与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一是要充分发挥知识增长对教育、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强化对高深知识的生产、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推进知识的普及、传播和提升知识的运用效率。二是要以问题和任务为驱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知识生产体系，以发展人的理性、探索生产高深知识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打破既有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壁垒，形成高等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知识生产模式。三是构建知识生产转移应用的创新系统。形成科研院所和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探求知识增长、企业将增长的知识应用到人类生产生活，政府从宏观上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知识生产战略，同时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及平台为知识生产提供支撑。（《现代教育管理》2017年第2期）

六版 “双一流”建设

立足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双一流”建设

1. 建立中国一流标准

目前的政策和学术讨论，“双一流”标准很大程度上由英美国家所引导。在“双一流”

建设中我们应该提出融合全球趋势和中国国情的世界一流标准。“双一流”建设要建立的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不是“一流的世界大学”，前者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自信，后者是对世界大学模型的盲目模仿。中国大学要参与国际竞争，但要掌握自己的竞争主动权。不要给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设定具体目标，而应在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形成过程中探寻什么是一流的最佳表现。盲目追求外在的指标很难实现世界一流，只有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确立的标准才是真正世界一流的。

掌握语言主动权是建立中国一流标准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大学在追求世界一流地位上不同程度陷入了误区，似乎只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才具世界影响力，才能进入世界竞争的舞台。几乎所有的国际期刊都是用英语出版，这种情况给熟悉英语工具的学者以绝对的优势。结果是英语的熟练程度成为抬高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因为会有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引用，而研究本身的质量则被低估了。仅从研究上来说，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抛开不同语言的影响才能真正判定其质量和价值。虽然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做研究，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过于夸大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如果一项研究不能为它赖以产生的环境所用，那么它还有什么实质价值呢？因此，“双一流”建设在一些评价指标上不能一劳永逸地借用国际刊物及其评价体系，而应该建立基于本国语言的效用和价值标准。

确立研究话语体系是建立中国一流标准的重要路径。目前英美标准的学术话语体系正在侵蚀高等教育机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本土价值。英美学术话语体系是在当地情境下逐步形成的，其价值不在于评价、规范、范式等，而在于内容和区域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习借鉴这些学术话语体系的同时，已经将形式重要性置于内容重要性之上。“双一流”建设亟须建立适宜我国情境的学术话语体系，籍此产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人才培养和社会应用)，去参与世界竞争。

形成一流的文化氛围是建立中国一流标准的重要方向。在“双一流”建设初期，我们制定各种指标体系，给高等教育机构指出努力和改进的方向。随着高等教育机构能力增强，标准已经逐渐不重要了，只要在有价值的领域达到卓越就实现了“双一流”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总和其他机构加以比较，它们都是在自己设定的目标上追求和实现卓越，这就是一流的文化氛围。

2. 采用分类推进战略

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政府需要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每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角色，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各类机构的均衡发展也是政府主要考

虑的事项。“双一流”政策设计要鼓励机构水平分层，给高校、地方、学生等更多的选择。促使高等教育机构定位不同的使命，制定有特色的战略图景。在“双一流”建设的机构遴选、建设标准、激励措施和评估监督上，政府需要设定更为多元的指标体系，不仅仅倚重研究及其衍生指标，还需重视本科生教学、终身学习、知识转移、区域发展、包容多元群体等。同时，还需要依据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等类别来设定一流的基准，以确保所有类型的大学和学科都有机会实现一流。在这个过程中突破世界一流大学 / 学科的单一模型，逐步完善高等教育系统的效能增值评估，增进高等教育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对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最优表现的理解。

3. 理性使用大学排名

高校和政府都要理性对待排名这一工具。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消费者包括考生及其家长、高校、政府等。如何成为大学排名的理性消费者是“双一流”建设中各利益相关者共同面临的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不能被排名所控制，应该将排名用于战略规划和质量改进目标，作为一种象征来凝聚成员、提高效能。政府在将排名整合进高等教育政策方面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匆忙利用排名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高校投机行为和模仿效应，并且对正常的学术交流构成威胁。政府可以应用排名来营造一种质量文化，促进高校间的竞争，对顾客和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

政府要构建理性的排名消费环境。首先要引导媒体、第三方组织、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立功能不同的多维排名系统，给学生及其家长、雇主提供更多样的比较信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媒体要合作开展针对排名结果的深入分析和公共讨论，引导社会正确理解大学排名。其次，考虑到排名可能被过度商业化而误导高校及社会，政府直接介入大学排名会引发更强的投机和模范效应，政府可委托第三方开展大学排名(包括机构及学科)。政府委托排名要区别于商业机构排名，排名类型要体现高等教育系统水平分层的特点，排名维度要纳入区域发展、社会包容、教育公平等价值目标。最后，将排名与效能监测、问责联合起来共同作为促进“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工具。排名是一种结果呈现。效能监测关注过程与目标的契合度，避免高校为迎合排名而忽略其多样化功能。问责系统确保这些机构实现了预设目标，而不仅仅关注纯粹的数字和结果。

4. 指向社会公正目标

“双一流”建设不应忽略高校的社会公正目标。首先，在“双一流”建设的机构遴选、建设目标和监督考核上纳入招收来自弱势群体的比例的指标。学生多元构成不仅是高等教育

系统的重要追求，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大学是有一些虽不能客观测量但能使人高尚的那些品质决定的，……诸如学生多元构成这样的无形特征，是大学自身身份和教育使命的核心。”这项任务不应完全落在低层次大学之上，世界一流大学更应该展现照顾弱势群体的价值。从教育公平角度，不能从政策上扩大“双一流”机构和非“双一流”机构间的招生资格差异。目前政策已经关注并采取措施来解决高校招生群体多样性的问题，中央政府实施的“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政策旨在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渠道。但是政策尚未关注到学科等级与招生群体多样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对畅通弱势群体纵向流动渠道有重要意义，对学科的社会公正价值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其次，要明确学科和高校的社会责任。每一类高校和不同学科都有独特的社会责任，仅仅依靠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测量这些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体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社会责任没有贫富差异、贵贱之分。因而在“双一流”建设中要明确不同机构的社会责任差异，重点测量不同机构对社会责任的使命陈述和目标实现程度。从学科上说，不要一味重视能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硬学科，人文社科等软学科对社会文化传承更加重要，更能体现世界一流的本土价值。

5.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加强“双一流”建设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首先，除了少数旗舰型大学，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有清晰的区域定位。在高校遴选上，对那些能参与到地方政策改进、科学技术地方转化、改善社区和弱势群体环境的高校给予重点倾斜，在建设目标以及考核上纳入区域要素。其次，建立区域政策补偿和倾斜机制。高等教育区域不均衡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方式存在问题，包括资源的分配和声誉的分配。一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不高，特别是一流大学及学科严重不足，并不完全是自身建设能力问题，而是在各类资源配置过程中逐步丧失机会所致。高等教育区域不均衡已经引发了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不应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再次扩大。一些高等教育市场发达的国家，大学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流地位是大学选择的结果。但是对政府支持的“双一流”建设，政府需要在经费和配套措施上给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补偿和倾斜。这种补偿和倾斜机制不仅仅是扶弱，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均衡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以此解决相关的招生名额分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对于这些依靠补偿和倾斜建立的一流机构，考核重点应放在促进区域发展上。（《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一)以队伍建设为核心，培育促进一流学术的体制机制环境

一流的学科意味着一流的学者队伍和学术成果。过去 20 年，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中国高水平大学在政府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的支持下，建设了一大批高水平学术队伍，涌现出许多国际知名的学科带头人。但这种增量式发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高校资源分配日趋紧张。因此，高校必须跳出原有单纯引进人才的思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梳理现有人才结构，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制定统一严格的学术规范，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体教师的学术创造力。在重视论文数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论文的质量。在教师晋升时应调低论文数量的权重，更加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实行“代表作”制度，激励教师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真正重要的问题。在管理服务方面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高校内部也应简除烦苛，减少教师学术工作以外的负担，激发教师创新创造活力。

(二)重视排名但不唯排名，跟踪学科国际发展动态，以评促建

不可否认，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工具，社会对大学排名有广泛需求。如果说一家排名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可能有所偏颇，那么综合考察多项排名，则可以相对客观综合地反映大学的总体情况。全球公认的世界顶尖大学和学科，往往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双一流”方案中明确“三步走”计划，一批大学和学科要逐步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这里的“行列”和“前列”尚无明确界定，但大学排名肯定是重要参照。因此，中国高水平大学要重视排名，但也不唯排名，明确自身位置，跟踪学科国际发展动态。定期邀请国际同行专家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发展进行诊断式评估，为学校的学科发展确定发展目标和战略，以评促建，合理分配资源并提高使用效率。

(三)优化学科布局，争创学科高峰

近些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追求大而全。传统的工科类大学开始加大力量发展文科和理科，原先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也下大力气发展工科。但任何一所大学倾尽全力发展所有学科，难度相当大，也没有必要，而且中国九所高水平院校在国际上为数不多的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各校“高原”学科和“高峰”学科分布的相似性较强。鉴于此，中国高水平大学在学科建设上要敢于“做减法”，根据自身特点重点发展若干优先发展的学科，淘汰和调整发展前景不佳的薄弱学科，在学科高原的基础上争创学科高峰。与此同时，高水平大学的学科建设还须具有前瞻性。当前，学科交叉已成为知

识创新的时代特征，很多原创性成果大都产生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领域。与中国其他大学相比，中国高水平大学基础学科实力雄厚，具备发展交叉学科的条件，应当瞄准未来，抢占学科发展的下一个“制高点”，努力锻造学科高峰。

(四) 人文社科建设要注重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结合

人文社会科学有别于理工医，具有较强的国别性，因而很难找到合理且国际可比的指标，目前国际上也缺乏对人文社科相对成熟的评价体系。虽然一些排名机构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入定量指标进行评价受到很大诟病，但不可否认，通过一些定量指标确实能反映出人文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当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发展方向不明确、原创能力不强、传播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中国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建设一定要注重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的结合。一方面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立足中国实际和有关中国的问题，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学术研究水准，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积极传播中国学者的声音。（《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

七版 大学筹资

推进筹资活动稳定、持续和常态化发展

国外著名高校的经验证明：校友捐款资助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经费来源。据统计，2010—2014年间，哈佛大学校友捐款占学校每年总经费的8%~30%，斯坦福大学约为8%—28%，伯克利大学稳定在7%~8%。我国高校需要学习和借鉴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明确组织职能，提高筹款人员素质。高校要高度重视校友捐赠工作，把这项工作置于财政管理的重要位置。高校必须加强组织机构建设，逐步实行筹资融资专业化管理，聘请企业或社会其他融资机构的专家、专业骨干负责校友筹款工作的全面开展，实行目标责任制，建构符合高校融资特点的市场运营模式。同时加强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和指导，打造一支专业性强的筹资团队，全面提升校友捐款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完善校友会组织，分离校友会与学校发展筹款机构。校友会是联络毕业校友的专门组织，其职能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校友的沟通往来，通过广播、报纸、邮件、互联网、手机网络

等联系体系与校友建立广泛联系，构建、巩固校友对母校的感恩之情与自豪感，建立密切的价值目标认同和学校发展认同的社会关系；在全国或国际范围内建立校友联盟，及时传播母校发展的状况、面临的困境，以及发展的愿景，激发校友对学校发展的责任感。就我国目前校友会的职能设计方面，大部分高校把校友会认同为筹款机构，校友会的职能包括了联系校友和筹集款项两个目标。在开展具体工作过程中，多数高校把筹款放在第一位，这导致校友的印象中校友会就是筹款机构，校友会发出的任何信息都是筹款等相关事宜。这种现状对校友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致使许多校友对母校校友会的联系存有猜忌或抵触。而国外一般实行校友会与筹款机构(学校发展部或其他名称)分离的做法。筹款机构面对校友开展募捐活动，也是建立在校友对母校产生良好印象的前提下，捐赠完全是校友的自愿行为。

建立专业化的校友筹款机构。筹款组织是一个专业化很强的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它需要配备具有极强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工作人员既要有融资的经验，又要懂得财务运作的专业技能与政策性规定。目前，我国大学的专门性校友筹款组织尚未建立，基本处在行政管理的初级层次，这种管理模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即“行政治校”的低级状态，其结果往往是效率与效益低下。

加强筹款管理的科学化、透明化，加大监管与反腐败力度。近几年，我国高校政府财政经费管理混乱、不透明以及腐败问题，对校友捐赠行为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校友捐款的积极性，一些校友担心捐款被挪用、滥用甚至贪污等。因此，加强高校财务制度改革并建立卓有成效的监督监控体系至关重要。定期召开会议，公布捐款日程，公开实行表彰，做好校友服务，及时汇报捐款使用情况，给校友充分的监督和参与学校发展的权利，解决好后续管理问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高校筹款管理工作。

培养学生，关爱学生。大学生入学报到标志着新的人生航标，学校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加强对学生的培养与联系，持续强化感恩母校的教育活动，对高校获得持续稳定的校友捐款非常必要。高校需要有意识地主动培养未来的校友，从根源上建立和培育校友捐赠沃土，让学生关心学校学科、科研和师资队伍发展，从而在毕业后主动向母校捐赠款项，为学校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6期）

高校吸引捐赠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捐赠的税收法规

我国自1999年出台了鼓励向教育捐赠的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规定个人或企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可享受个人或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是我国捐赠的免税额度太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的得额中扣除”。但如捐赠金额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不能跨年度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有跨年度抵扣税款的法规支持。目前捐赠减免税手续过于繁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除此之外，捐赠免税存在一些限制性的约束，如纳税主体捐赠母校必须与纳税主体税收减免的地域一致，否则不能享受减免税优惠，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在母校所在地之外的城市工作校友的捐赠。所以，为发挥税收对教育捐赠的激励作用，我国政府应完善捐赠的税收法规，提高捐赠税收的减免额，简化捐赠减免的流程，取消一些限制性的约束，尤其取消地区分割限制，同时，丰富减免税的捐赠类别和方式，促进校友向母校捐赠。

（二）构建积极的校友文化

校友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精神。校友文化不仅体现为校友与大学间的基本关系，而且是一种校友捐赠文化。“校友与母校共荣辱”的价值观是校友文化的核心”，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教育，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知校、爱校活动，加深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将此价值观逐步深入到人心；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与毕业校友联谊会，如邀请典型校友和在校学生进行座谈，或举办成功校友报告会等，让在校的学生参加大学的校友捐赠活动。让在校生在现场中感受捐赠氛围，从在校时就培养捐赠意识，传递“校友捐赠”文化，为将来的捐赠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友活动，如邀请校友代表参加学术报告会、文艺演出、运动会等加强与校友的联系，通过大学与校友之间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唤醒校友的主人翁意识，从而激发校友回报母校的热情，让广大校友关注和了解母校的发展的同时，给予毕业校友在学校的管理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建议权，让校友加入到大学建设的行列中，允许其参与母校发展建设政策的制定，深化校友对大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校友捐赠。

（三）积极奖励校友捐赠，建设良好校友捐赠环境

对于关心和支持母校建设与发展的校友，大学都应给予衷心的感谢，并给予荣誉称号，根据校友捐赠金额，设定不同的奖励。除荣誉称号激励外，命名激励是影响校友捐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学可通过给予捐赠金额较大的校友获得校园里的标志性建筑物、道路、座椅等的冠名。一方面，可以使得命名的校友扬名，而且可以影响和激励他人效仿捐赠校友，加

入捐赠的队伍；另一方面，这些建筑物、道路等会形成校友捐赠环境，影响着在校就读的大学生，使得他们在学习期间受到校友捐赠文化的熏陶。（《高教探索》2016年第7期）

八版 通识教育

从“通识教育在中国”到“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1. 大学能否提出现代中国的人才培养目标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成立，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提出现代中国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个命题的挑战性在于，它必须既是中国的（非西方的），又是现代的（非古代的）。

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并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反而以与传统文化断裂，转而模仿西方大学为标志。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主导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通过教育塑造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自信的、有教养的现代中国人，既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观念，也不能依赖中国古代的思想，简单复原到科举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教育——这需要当代大学主动创造。

目前，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目标体现出了既中国又现代的构想，值得一观。复旦大学推行全校通识教育已超过10年，其育人目标的官方表述为四种能力及相应心智状态的养成：

(1) 对人类文明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解的能力，直面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发展与挑战；

(2) 现代性社会基础性框架认识的能力，充分体会个体尊严、社会价值与全球化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3) 对中国文化与智慧有独到生命体认的能力，从宝贵的传统中汲取人生的滋养；

(4) 对科学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把握的能力，认同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其中(2)(4)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精华，是塑造一个优秀的现代人必要的素养和能力，(3)希望学生在中国传统中安身立命，获得精神上的滋养，文化上的归属感，而(1)横跨不同文明和古今，作为最高目标被提出，意图使有的学生能够在未来担当起文明演进的重大责任。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2015年底在全校公开讲座“通识教育大讲堂”启动仪式上提出：“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地停留在过去，也不要一味地去模仿美国的博雅教育，我们要走出一

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并且将“懂得社会、懂得自己、懂得中国、懂得世界”设置为北大通识教育目标。在关于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理解方面，他提出：“要让学生真正懂得中国，认识和理解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古典文明、近代现代传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将思政课纳入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范畴内，通过经典阅读、小班讨论、反思性思维训练，真正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不盲目模仿西方，建立理论自信、走一条中国之路。我们也要让学生真正懂得世界，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其他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了解现实存在的世界，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了解世界格局，了解为什么世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在林建华发言的基础上，北京大学通识核心课程围绕中西文明及现代社会，设置了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人文艺术与自然四大系列。其中，中国文明及其传统位于首位。

2. 大学能否确立与其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通识与专业结合的教育模式

中国大学类别多样，层次各异，不应当追求划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教育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条件更接近通识教育理想，数量庞大的理工科大学、行业性大学等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效率突出，但不一定能提供综合性的教育资源，也需要开展相应的通识教育。同时，以专业院系为基本组织单位来实现培养学生和开展科研等各项大学职能，是中国大学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组织规范和固有观念。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究竟在建制上如何实现？多重条件下，通识教育的模式一定不是唯一的。

首先，是否需要成规模地专门开设通识课程，还是通过提升专业课程质量，使专业教育能够传达一定的通识精神、有教养的职业人精神。后者实际上对专业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局限在褊狭孤立的知识点上，要把知识讲得更通透，更注重能力的培养，还要使专业课程更加系统化、易于触类旁通，活学活用。其次，假设成规模地开设通识课程，对于条件较成熟的综合性大学而言，在本科阶段通识与专业区分为1+3、2+2、3+1等学制上有明确侧重的两阶段，还是两类课程穿插在四年中同时推进？分两阶段的做法注重通识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要求第一阶段通识课程能够充沛供给，从根本上调整师资结构，还要考虑招生改革和相应在前一阶段通识教育结束后以何种双向选择机制引导学生进入专业的问题。不分阶段的做法相对折中，开课压力分摊到四年，显得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也未必影响招生和二次专业选择，比较容易实现，但会损失教育的统整性。再者，假设不分阶段穿插修读通识课，学生的选修应当以越倾向专业的、实用的、大众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远离专业为原则还是就近专业为原则？远离原则有利于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框架，得到健全的能力锻

炼，从而获得从整体上对文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对人生道路和生活的判断力。就近原则有利于对学生所学专业形成有效的支撑，从而拓展其掌握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透彻性和灵活性，增进与专业相关的人文素养。远离原则和就近原则都是通识教育的途径，前者的目标适合在专业上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被解读为培养领袖、精英的教育，后者更符合大众的、以实用目的或专业化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定位。重要的是，两者理论上是连续可迁移的，并没有对学生个人预设精英 / 大众截然两分的限制，主要取决于学生对自己的期许和是否学有余力。

3. 大学能否从中国书院传统出发，在第二课堂和寄宿制共同生活的教育方面与既有学工系统理顺关系

在课程之外，寄宿方式和第二课堂活动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另一支柱。2005年9月复旦大学在中国高校中率先以“书院”之名建设共同生活的混合寄宿制度，随后不断充实其教育内涵，试图与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相承接。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将课外活动与寄宿纳入通识教育的建设范围。师生从游，同辈共学，自主探究，自律自治的古典书院传统在中国现代大学或许就此得以焕然一新。

不过，从复旦大学的经验来看，书院制度改革涉及深层结构性变化，会对原有体系带来很大压力。其关键在于，是否要从原来按专业区隔住宿、学生工作部门归属专业性学院的模式，变为混合住宿，学生工作部门脱离学院，从而成立以书院为单位的的管理方式。实践证明，混合住宿既具有一定的人际教育价值，也可能影响专业学习的卷入，如何才能扬长避短？混合住宿还能精细地区分为房间内混住与邻居式混住（房间内同专业而邻居房间是其他专业），房间内混合又可以是跨文理大类的混住、相关相近专业混住（如数学和金融、化学和生物），也可以是同院系内跨专业的混住（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等。

4. 知识精英能否在必读经典上达成一定共识

什么是高等教育必须传授的内容，这是区分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什么是某所大学毕业生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或素养？21世纪的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发展，使这类问题的答案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只要这类问题仍被追问（历史上这类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而又难以回答），就必须在通识教育的内容上做出回应。通识教育具有文明传承与凝聚人心的使命，其教育素材首先应当代表着本文明国家历代相传的最有价值的内容。能否在必读经典上达成一定共识，是决定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落地生根的本质。

5. 能否切实吸收国外有效教学方法

为了确立本土的大学通识教育，并非一味地排斥西方经验。在课程教学，特别是以学习

为中心的有效教学方式上，西方大学的种种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好比假设西方率先创造了圆形的车轮，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而非得重新创造出不同形状的车轮。教学手段的有效性和效率通常是能够得到科学实证的问题，并不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国内通识教育的先驱大学已经引入了许多旨在促进学习投入的教学方法，最常见的是借助助教开展大班授课、小班讨论以及全面规范课程大纲，还有强调及时的作业反馈，推行合作学习、随堂小测试等教学技巧，也有的设置 officehour，制度化地促进师生互动，严格作业与考核管理，在保证助教数量的基础上通过专门培训提升工作能力等。

6. 能否从中国大学实际出发，构建管理和质量评估体系

随着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迫在眉睫。目前，这项工作才刚迈出了第一步，工具设计和分析方法还需要不断优化提升。（《新华文摘》2017年第1期）

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通识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而是深刻根植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之所以要实行通识教育，不是因为通识教育是个好东西，而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角度，重新设计建设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

重建中国的通识教育，我们需要从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如果说，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古希腊的话，它的另一盏灯就点亮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其实早就蕴含着通识教育的思想，并且远远超越西方。这个思想不仅是指“通识”，而且是指“通德”。这个“德”就是价值观，也即道德。

在古代中国，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德育，其次才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实践了孝悌信爱仁等一系列道德目标之后，还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分列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德行为最高科，言语次之，政事又次之，文学（即知识）在最末。道义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职业。这些珍贵的教育思想发展到后世，则形成了所谓“通儒”之说。顾炎武在《曰知录》序言的开篇就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通儒”才是中国教育的最高境界。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论证中国古代也有通识教育，以此来说明其实我们并不比西方差；也不是要像新儒家所倡导的那样，恢复诵读儒家经典的传统做法；我的意思是说，重建中国特

色的通识教育之路，我们至少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不同文化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思想源泉。正如西方通识教育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只有也正是这个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才更契合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通识教育自有其不同的立场。正如西方通识教育的立场是西方人和西方一样，中国通识教育的立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人和中国的立场。第三，不同社会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社会问题。正如西方通识教育要解决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中国通识教育也必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相对立，而是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一定要和西方通识教育有所区别，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而且，我们并非为了形成特色而追求特色，而是因为上述三点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通识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以往这项工作是由思想政治课和党团活动来完成的。这是必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不够”的意思并不是时间不够。目前，政治理论课学分一般为12学分，约占140总学分的9%，大约相当于4门专业必修课，这个比例不算低；“不够”的意思也不是投入不够。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中详细规定了一、二、三级指标的具体内容，从组织到教学到队伍到学科建设再到特色项目，可谓包罗万象。但问题的关键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一定需要做全样本的调查问卷，只要到真实的课堂里去看看学生们上课的状态和表现就可以一清二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所遇到的问题本身就极具挑战性，完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兴趣。为什么那些原本在茶余饭后引起人们浓厚谈性的问题一旦走进课堂以后，就被缩减到只剩下一大堆需要学生背诵记忆的年代、地点和毫无生气的知识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换另一种方式——通识教育的方式呢？不是告诉学生那些已经被认可的现成结论，而是要把学生的思维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通过提出一系列复杂的真实问题，引导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学习、思考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要知道那些他们必须知道的事实和结论，而且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教师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不仅要让学生懂得中国社会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养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并能够领导中国未来的政策。

第一，这项工作不能等到大学，必须从中学阶段就开始。中学也应当按照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式，凝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共识。这才是中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否则，即

使建了再多的学校，教给学生再多的知识，学生考了再高的分数，把再多的学生送进大学，我们也没有完成教育的使命，尽到教育的责任。

第二，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对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文明和价值观有所了解 and 认知。但这种了解不应当是浅尝辄止，而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各种文明的精髓。比如，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文明的主要观点；等等。课程不能纠缠于具体的知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博大精深，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像专业教育那样去学习，必须使他（她）们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掌握最基本和最精髓的内容。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比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价值观。目前，许多大学雄心勃勃地仿照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模式开设了类似的“人类文明”课程，着力点多在这一点，其实第二点才更为关键，实现起来也困难得多，需要教师和学生投入更大的精力，但非此则不能实现通识教育的真正目标。

上述两点是建设中国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但做到了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成了通识教育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课的“旧酒”装入通识教育的“新瓶”之中，那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通识教育，我们还必须做到：

第三，帮助学生切实提高交流的能力。通识课程一定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在课堂上开口说话。要让他们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正确理解他人的观点。如果在通识课堂上无法得到这样的训练，那么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其他的正式机会去得到这样的训练。

第四，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收集信息，阅读文献并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这些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如果在接受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养成了这一习惯，那么，无论未来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找到相应的办法去解决。

第五，使学生的人生变得更有趣味，更为丰富。通识教育要提供关于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但这些课程的价值并非给学生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教授一些浅显的技能，成为他们在他人面前炫耀的资本，而是要处处指向人生，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引导学生追求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高尚的精神生活。

第六，帮助学生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狭隘。我们要实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并非把四年的本科时光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后两年接受专业教育——正如目前大多数大学所做的那样——而是要把通识教育的灵魂和精神

渗透到整个本科教育之中。一方面，大学需要从学校层面而不是院系层面出发建设一些目标明确的通识课程；另一方面，院系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也要随时随地关注通识教育的目标。保证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需要理解什么是中国的通识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时刻不忘通识教育的目标，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许，对于目前的通识教育而言，对学生的教育尚在其次，对教师的培训似乎更为紧迫。毕竟，教师是课堂的灵魂，所有的通识教育只有通过教师才能完成。（《中国大学教学》2016年第11期）